

日本的服饰文化与社会心理

金香花

若说大家穿戴一样的好处在哪里,可以说在日本,服装不仅是认同感的基础,可以塑造团队精神、伙伴意识,它还类似是保护膜一样的东西,防止不必要的麻烦。制服这一符号是对自我意识的隐形洗脑,它能巧妙地分割不同的群体,又反衬集体,赋予成员以角色意识和集体意识。礼服乃至制服是人类走向文明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起了“化性起伪”的功能。

说起日本人,人们眼前总会浮现这样一些形象:海军装校服妹,穿着做旧衬衫、戴着黑色礼帽的日本男人,以及戴着毛线帽,穿着素色宽松长裙和厚底鞋的日本女人。

服饰之于现代人的意义早已超出取暖遮体的功用,已然成为身份的符号。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服饰是人类隐性的语言,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也是自我精神的延长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日本的服饰文化中,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日本的制服。1886年江户幕府为陆海军制定“诘襟(がくらん)制服”。江户时期,日本唯独特与荷兰通商,がくらん也就是“学兰”的意思。这种不同于日本传统服装的洋式军装被称为“洋服”,洋服一词至今被日本人广泛使用,泛称衣服。制服最早是官给品,工部省工学寮(后为工部大学)和札幌农学校,自1873年开始制作校服。后皇室大学学习院(现为学习院大学)于1879年,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于1886年制定校服后被其他学校广泛采用,男生以陆军士官服样式,女生则以海军水兵服样式为基本款。据说孙中山于1895年年底前后在日本的横浜剪辮、易服,并借鉴日本军校的士官服的样式学

做中山装,曾一度作为时尚和革命的象征风靡了中国。日本小学生背塑形书包“ランドセル”,也是对荷兰军用包的改版。我每天能在街头看到三三五五结对上学、放学的可爱“小乌龟们”,头戴圆顶礼帽,背着龟壳般的“ランドセル”。

制服在日本非常普遍。学生有校服,服务行业有制服。孩子上保育园,每天户外活动时都要戴着保育园准备的统一的帽子,帽子分黄、粉、蓝、绿,不同班级不同颜色。若说大家穿戴一样的好处在哪里,可以说在日本,服装不仅是认同感的基础,可以塑造团队精神、伙伴意识,它还类似是保护膜一样的东西,防止不必要的麻烦。制服这一符号是对自我意识的隐形洗脑,它能巧妙地分割不同的群体,又反衬集体,赋予成员以角色意识和集体意识。代表理想的职业和优秀的学校的制服,既能实现成员的优越感,又吸引他者的羡慕与憧憬。制服通过这种视觉统一性内化为心理性的认同。若说制服的缺点使个体无法自由表达个性,那么这一缺点通过制服与他者的区分中以优越感的方式给予心理补偿。其他国家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通过制服对人的“分类”。除了军队、警察等需要极强的认同性的行业之外很少穿同样的服装。无论是哪个国家,

不会允许穿便装的交警、护士上岗,这些工作需要向对象明确传递自己的职业功能。

校服对于经济条件不好,对时尚没有兴趣的小孩而言是个好事情。就像所有日本中小学午餐都由学校统一供应,每人都是同样的一份,不供你选择——这可以有效避免每天带便当所带来的无谓比较:看哪个妈妈的便当漂亮,哪个妈妈的寒酸。校服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对学生规范意识的明确要求。就算是习惯马虎的孩子,穿了制服之后就会多少努力保持行为举止该有的正确性。日本的“七五三”节,即男孩在三岁、五岁时,女孩在三岁、七岁时要穿和服,由父母领着去神社祈求健康平安。那天,优优的妈妈告诉我,她给三岁女儿穿了和服之后女儿突然变得很乖,而且注意管理表情和姿态。这确实验证了礼服乃至制服是人类走向文明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起了“化性起伪”的功能。

这实际就是制服所具有的重要的道德功能。穿戴制服表明一种社会角色,要求公共意识,也就是对其身份的提醒,无形中被要求公私分明、职业化。我们承认日本人的服务意识为世界一流。若一个服务生对你礼貌有加,请不要自作多情,这只是他的工作,并不带有任何私人感情,对服务对象的尽心

尽职实际是日本人的“公事公办”。这也是追求自由服饰的国家和每个行业有严格制服的人对工作态度的意识的强弱对比。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现代人对服饰的功能性有了严格区分,这至少是以经济条件充裕为前提。日本绝不会有人穿着旅游鞋、登山服上班。日本学校也都会有更衣室,因此有体育课的日子不用一早就穿上运动服上学。在日本的学术会议中,中国人的识别度较高,不说气质方面,只因其着装的相对随意,常见如格子衬衫、夹克衫。在开学典礼和会议或者面试等场合,日本人的着装永远都是低调至极的两个扣子的黑色西装长裤或西装裙套装,挎着方方正正毫无装饰的黑色革包,这会让我瞬间穿越,那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小时候跟着妈妈在市场上看从朝鲜进口的黑色革包。

西装这个东西由西方人发明,现在东方人更愿意穿,也真是怪现象。服装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似乎没有多大关系。据2012年的一次抽样调查发现西欧国家穿西装比率并不高,比率高的居然多数在亚洲,印度为第一位。美国曾对试图超越苹果的三星掷言若想做到这一点,你们先允许你们的员工

穿牛仔裤,这意思也就很明白。在我看来中国对服装相对自由,首先没几个人是正装上班的,穿旗袍的是门口的迎宾员,穿西服打领带的除了结婚的,一般是保险等各类销售代表、房产中介。如果对三国进行比较,到了午饭时间,韩国的光华门,日本的六本木、秋叶原是一色西装,中国则不见得,棉质裤、牛仔裤会占近半数。

不过在这样高度统一的制服中也有对美的追求的小心思。日本的朋友教了我一个有趣的判断方法,看到马路上的校服妹,如果她的裙子越短就越说明是高年级的,她们会修短裙摆。不过校服短裙往往是学生妹的专利,如果职业女性穿强调女性身材的迷你裙,那一定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中国女性服装自由度极高,且二三线城市女性着装不分年龄也较为普遍。我称之为童装化现象。在日本大学生也好,上班族也好,全职主妇也好,一看穿着则非常容易判断他们的身份,归类某一群体里,所谓穿着得体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制服是角色身份的约束,你想时髦,不要在公司或学校,周末在家时髦吧。周末日本人常见的是头戴宽檐礼帽,穿破洞牛仔裤上面一个T恤

(下转15版) ➔

◀ (上接13版)

“同案同判”。因而从事研究的人不能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和论述,而必须站在普遍性的立场上,使自己的认识和表达对他者、对沟通活动都开放。但文科主要以人或者人际关系为研究对象,需要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涵义脉络以及历史演变过程来把握知识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真理以及相应的价值判断必须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可变性关系中把握,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或者不完全性。

由此可见,文科的学术活

动不得不以存在复数的记述体系、复数的正确答案、复数的普遍性真理、复数的价值判断为前提,鼓励思想和意见之间的竞争,并反复探讨正当化论证的适当理由。实际上,文科研究的乐趣也恰好就在这样多层多样的话语空间以及沟通行为的开放性之中。文科研究的真谛可以理解为在主观与主观互相碰撞和博弈过程中话语的因势利导,主要通过一系列批判性思维、论证性对话、基于推理的沟通活动来达成共识。尤其是在法学界,几乎所有研究都与“善于权衡的技艺”相联系,因此相应的对话和沟通自始至终都包含价值的评判。

因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须承认不同记述和不同逻辑的并存以及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还有必要适当为学术保留一些暧昧的、可辩驳的、非决定论的空间。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学术的本质是发现或者邂逅未知对象,与之进行对话,进而通过实证和诠释不断推动话语体系的自我更新或者革命;通过与他者的交流而实现相互理解,在基于逻辑推理的反驳和商谈中进行知识创新,并通过涵义的解释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视野里,任何词汇、概念、命题、理论以及逻辑都不是绝对的,研究方法也更具有动态

性,强调怀疑、反思以及批判。简而言之,什么都有,但并非有什么都行——这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和竞争力的本质性条件。为此,文科的发展特别需要自由和宽容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大学的改革》一书,我觉得钱颖一教授有两段话是特别振聋发聩的。他说:“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文化传统强调服从权威、尊重师长,容易抑制独立思考。中国文化传统中也缺乏以实证和逻辑推理方式做分析性的论证。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不言而喻,批判性思维是超越引进和模仿、

自主进行原始创新的源泉,同时也是领导力的基础。所以他特别强调大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在陶冶批判性思维方面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养、知识渊博、胸怀远大、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导者。如果我们今天再不进行大学本科教育的深刻改革,20年后的中国将不会出现大批科技创新人才以及对对中国和世界有影响力的领导者”。这样的“盛世危言”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倾听和记取。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